

← (上接7版)

许多方面都认同布尔什维主义，但终究算不上同路人。

第三部分始于1920年，张东荪陪同罗素访问湖南。初次深入内地让张东荪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究竟有多么贫弱。在罗素的影响下，他又重新拾起自己在1913年表达过的观点，主张发展实业优先，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各种主义则都应当缓行。这无疑给当时的社会主义热潮泼了一盆冷水，特别是在不久前，他还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最主要的鼓吹者之一。很快他就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群起而攻之的对象，并由此掀开一场社会主义大论辩的序幕。

颇具戏剧性的是，罗素在离开中国前突然改变了想法，认为中国缺乏自己支持的基尔特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土壤，所以还不如走俄国道路。这一变化让张东荪非常尴尬，但他并没有退却，反而越战越勇，在辩论过程中更加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理由：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阶段，中国没有“拒绝资本主义的能力”，因此必须长期忍耐它带来的罪恶后果；而且“忍耐”的对象是本国资本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抵御国外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压榨；中国并没有“阶级对立”，效仿俄国只会导致一场实为暴民动乱的“伪劳农革命”；国家社会主义会让政治吞噬社会，也即让国家包揽一切……在辩论中，他明确提出基尔特社会主义优于布尔什维主义，因为前者注重实业，只是要求对资本主义加以限制，并且对政权也没有太大的野心，不打算搞激烈的政治对抗和阶级斗争。但事实上，张东荪又不得不承认罗素的判断，即基尔特社会主义更适合西方发达国家；在中国，按照张东荪自己的逻辑，它与布尔什维主义一样都不具有可行性。所以高波也忍不住评论说，张东荪只是个“勉强的基尔特社会主义者”。

论战结束之后，布尔什维主义在现实政治中的发展肯定超出了张东荪的想象。而他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则只能长期停留在象牙塔之中。他似乎已经跟不上形势，或者不愿意去紧跟这样的形势。面对风起云涌的五卅运动、国民大革命和北伐战争，张东荪竟不置一词。1927年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时，张东荪还作为“学阀”被通缉，不得不避入租界。

但随着时间进入1930年代，张东荪的思想轨迹再次出现转折。而这次转折，同样以国际国内的重大政治格局变化为背景。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国家和民族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救亡图存再次成为最为紧迫

的时代主题。张东荪也就不再坚持“政治/社会”二元分离的信念，开始明确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现在他认为，要想实现民主，必须得有一个统一且强大的国家。而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功范例，让张东荪看到布尔什维主义同样可以发展实业，因而需要放弃资本主义是强国必经阶段的错误看法。种种这些变化，都促使张东荪与布尔什维主义和解，并且与中国共产党走得越来越近。

在1949年后，张东荪回顾了自己民主思想历程：第一期是在抗日战争之前，他“抱着旧民主的梦想”，“既反对国民党，又反对共产党”；第二期是抗日战争到1947年，此时他“想与共产党合作，而不是受共产党领导”；第三期是1947年到新中国成立，他接受共产党领导，但还是“希望在新民主之内仍可以保留一些旧民主式的自由”。《追寻新共和》的副标题把时间限定在1932年之前；也就是说，张东荪的民主思想刚刚转入他自述的第二期，这本思想传记就落下帷幕了。但是高波的思考与论述，显然溢出了自己设定的这一时间段。特别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也即第十一章，从表面上看是在介绍张东荪如何完成第二期的转变，但实际上却是为张东荪整个人生命运作出总结陈辞。

高波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张东荪在本质上还是一个深受传统熏陶的士人，始终不忘政治与教化的双重使命。因此他所追寻的“共和”，无论展现出怎样的理论形态，骨子里都是基于他对自身传统的“乡愁”。他从头至尾都不是大众民主的真正支持者；在他看来，工农只是统治与教化的对象，而不可能独立具备实施善治的能力。面对传统士人阶层已经堕落坍塌的事实，张东荪认为士人的历史使命应当从“辅治政治”转向“辅治社会”，在社会和文化层面成为大众的导师；士人阶层非但不应当恐惧大众，反而应当与大众打成一片，并最终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新生”。张东荪后来选择支持共产党，其根本动机并不是为了改造政治，而是为了改造社会；只要社会改造好了，政治回归“正道”也就指日可待。

(作者为上海大学法学院讲师)



敦煌为什么叫敦煌

——兼谈吐鲁番及相关地名的来源

姚大力

汉文明的覆盖面向西延及河西走廊，时间不算太早。西汉置四郡于兹，郡名恐怕都属于用汉字记音的当地地名。东汉人应劭注《汉书·地理志》，谓“张国臂掖，故曰张掖”，只可能是一种望文生义式的“通俗辞源学”解释。敦煌和吐鲁番两地名同样是进入汉语的外来语词。著名的古代于阗塞语专家贝利在数十年前已指出，两者都来自塞语、中亚粟特语等所属之东伊朗语族的语词 *druvāna* (或者也可能是经压缩的 *druva-pāna*)，译言“坚固的城堡”(按、于阗语 *druva-* 即译言坚实、稳固)。白一平和沙加尔在不久前出版的《上古汉语的新拟构》里指出，上古汉语里带-r收声的字，在中古汉语中多被置换为-n或-j。所以中古汉语读作 *dun* 的“敦”字，其上古发音当为 *dur*，正好用来译写源词里的首音节 *dr(u)-*。至于用“煌”来译写 *-vāna*，盖因古无轻唇音，故以汉字写其音时读 *van-* 为 *wan-*，词尾的 *a* 省略不译。吐鲁番之名曾以 *tturpane* 的形式出现在于阗塞语文书里。该地名今虽仅存于维吾尔语中，作 *Turpan*，但它显然是维吾尔人在进入新疆时从更早先的当地土著人群那里承继来的原有地名。所以它也理应从 *druvāna* 或 *druva-pāna* 演变而来 (*druvāna / druva-pāna > turpan*)，且由其原意转义为指称整个盆地的专名。

那么它们最初究竟是谁家的“坚固城堡”呢？我以为它们最早应是月氏位于其疆域东部的两座边城，由以控扼分别从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北麓进入东亚汉文明地区的咽喉要道。这里涉及到《史记·大宛列传》所谓“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之语里的“祁连”到底是哪座山的问题。若其所指真如一般以为的是今祁连山，则月氏作为一个游牧大国的生存空间就未免过于局促了。全祖望曾考证云，汉代有两祁连，分别是“甘州(今张掖)之祁连山”(即今祁连山)和“伊州(今哈密)之祁连山”(今东部天山)。马洛里和梅维恒在所著《塔里木古干尸：古代中国与神秘的来自西方的最早居

民》里主张，月氏始居之祁连，乃北祁连是也。此说看来与月氏之为游牧大国的史实更相符合。敦煌和吐鲁番所以会成为月氏东方的两大重镇，因此也就完全得以说通了。

游牧于东部天山北侧的月氏人，至少曾将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东半部分纳入版图。唐时尚称该地为“睹货逻”；唐后期迁到那里的回鹘人亦以“吐火罗”名之。月氏人说的是一种东伊朗语，与被他们征服的吐火罗人所说的吐火罗语不能互通。但据贝利的研究，“睹货逻”或“吐火罗”是一个东伊朗语词汇，可以拟构为 *tu-gara*，译言“大山脉”，在此处系指东部天山而言。然则吐火罗是月氏统治者对被征服的大山以南绿洲居民的称呼，而不是“睹货逻人”的自我称谓。随着月氏人受稍晚兴起的匈奴侵逼而西迁，月氏帝国以山北为其根据地、而称山南被征服地区为睹货逻的国土结构，也被他们照搬到锡尔、阿姆河之间的“河中”地带，以及阿姆河南岸的希腊化国家巴克特里亚的故土。于是在阿姆河南北两岸也出现了一片以“睹货逻”命名的地域。相隔万里之遥的两处“睹货逻”故地，都见于追述玄奘西行求法的《大唐西域记》。

然而，保留在唐代文献里的这个地名，是否还可以向前一直追溯到月氏时代呢？答案是肯定的。这个源于 *tu-gara* 的地名，在《史记》里就被转写为“大夏”！

司马迁在叙述张骞西使之行迹时提到的“大夏”，向来被解读为从阿姆河南岸发展起来的希腊化王国巴克特里亚。关于“大夏”如何被“吐火罗”摧灭的过程，其头绪因中西史料的畸零不全而显得极为复杂。然而巴克特里亚何以被汉文史料称作“大夏”？这个问题从未获得过真正令人满意的解答。或因西汉陇西郡置有同名的大夏县，以及中国古文献里一些混沌不清的记载，遂据汉朝人“相信”而遽然断定，此一明显属于东伊朗语文化圈的希腊化人群，竟是从中国晋南西迁的尧帝部下、“陶唐氏遗胄”。是说无论如何难以使人信服。

“夏”字在3至4世纪之前是以 *gr-* 开头的复声母字。《史记》记录的中亚“大夏”，实在就是 *tu-gara* 的汉字写音形式。它只能是因月氏西迁而从塔里木被移植到阿姆河南北的一个新的“睹货逻”地区。它既然位于巴克特里亚王国的故土，则《史记》在追述不久之前发生在该地域的事件时，用后来形成的大夏——睹货逻之名指代业已灭亡的巴克特里亚，这是完全可能的。但我们断不能因此就以为，它原本就是用来指称巴克特里亚的汉语专名。

经贝利揭出的睹货逻——吐火罗之名源于 *tu-gara* 的秘密，令我们想起长久没有解决、甚至长久没有人试图解决的昆仑山之名的来源问题。昆仑一名的辞源，或许就是译言“山”的伊朗语词 *gara* (*gara > gar-ran > gan-ran > 昆仑*)。若然，则昆仑山一语的构成，颇与密西西比河同。密西西比者，本为印第安语河流之意；在它之后加一“河”字，当地语里原指代河流的普通名词就变成专指某条河的特殊名词了。汉语以昆仑为山脉专名，正与密西西比之变身为专名相类。

最后还想顺便谈谈月氏一名的读音问题。月氏之月应读若肉的说法，见于北宋初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卷184“大月氏”条。那时候汉语中“日”声母的音值尚未“儿化”为 *r-*，而仍然读作 *nj-*。因此属于“日”声母的肉字，与属于“疑”声母 (*ng-*) 的月字，读音差别不大。换言之，乐史之说在他的时代是可以成立的。然而12至13世纪后，“日”母发生“儿化” (*nj- > r-*)，月字与肉字的读音差别因此也变得很大。此后再沿用过去的说法，读月为肉，就根本不可取了。至于月氏之氏应读若支的见解，则至今看来仍是正确的。无视古音早已变化，而欲以今音训古读的类似问题，还发生在龟兹应读为丘慈、车师应读为拘师，乃至吐蕃应读为土播之类似是而非、但流传极广的主张之中。对这方面的历史地名知识作一番清理，或许还是有必要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